

试论藏传佛教发展的几个重要时期

王通玲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甘肃 天水 741000)

[摘要]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与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并称为佛教的三大体系。它是以佛教教义为基础,经过和苯教长期斗争、吸收、融合以后形成的特殊的西藏地方形式佛教。本文以藏传佛教的发展为脉络,阐述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经历的几个重要历史时期。

[关键词]藏传佛教;吐蕃;苯教

[中图分类号]B94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08-0053-02

一、佛教最初传入吐蕃

西藏佛教史籍对佛教最早传入吐蕃的记载,几乎都说是在松赞干布以前五辈,即拉托托日年赞时期“天降四宝”的神话传说,这四宝分别为“百拜忏悔经”、“舍利宝塔”、“六字真言”、“法教规则”,都属于印度佛教密宗。从这个佛教最早传入吐蕃的神话传说中可以推断,佛教最早是在公元 5 世纪时传入吐蕃的。而公元 5 世纪时吐蕃南临佛教的发祥地印度,内地正处在南北朝对峙的时期,这是佛教很发达的一个历史时期,尤其是北朝的魏(4-6 世纪)和南朝的梁,特别崇信佛教,吐蕃西北面为西域于阗,佛教文化的影响也很深远。公元 5 世纪前后,尽管当时藏族还没有创立和使用文字,但吐蕃周围都是信奉佛教的国家和地区,佛教在这一时段前后渗透到今天的西藏地区是完全有可能的。尽管如此,佛教大规模地正式传入吐蕃应该是从松赞干布建立奴隶制的吐蕃王朝开始的。这一时期,藏族基本上统一于吐蕃王朝的统治之下,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王室与贵族势力的斗争使王室需要寻找新的思想工具,吐蕃王朝与唐朝及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迅速发展。社会的剧烈变化为佛教的大规模传入提供了社会的需要和实际的可能。并且此时吐蕃王朝创制了藏文,使藏族社会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关于佛教传入吐蕃一事,藏文有明确的文字记载。

公元 7 世纪初,吐蕃王朝第一任赞普松赞干布先后迎娶了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两位公主入藏时分别携带了一尊释迦牟尼 8 岁和 12 岁等身像。这是佛教正式传入吐蕃的标志,由此也揭开了藏传佛教形成和发展的序幕。松赞干布时期创制了藏文,建立了一些寺庙,翻译了部分佛教经典。此时的藏族社会开始慢慢接受佛教,但是佛教内部派别很多,各种佛教的学说还没有被藏族社会理解和消化。且吐蕃王朝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武力扩张上,王室虽然扶持佛教,但王朝的实权把持在信奉苯教的贵族大臣手中。松赞干布时期,佛教最初传入吐蕃,但此时遗留下来的佛教基础并不强大,而苯教的传统势力是根深蒂固的,在贵族和民众中有很大的影响力。

二、印度佛教在吐蕃的发展

佛教从印度和汉地两个方向传入吐蕃之后,与吐蕃地区的原始宗教苯教相互斗争、相互融合,最终印度佛教战胜了苯教和汉地佛教并生根于吐蕃。

吐蕃王朝到了第四代赞普赤松德赞时,非常热心于发展佛教,并且依靠拥佛大臣的支持,迎请了印度的寂护和莲花生大师入藏弘法,修建桑耶寺,正式剃度藏族人出家,翻译经典,召集各教派之间的大辩论,为佛教在吐蕃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莲花生大师出生于印度乌苻国(今巴基斯坦),其父为印度密教金刚乘创始人,受其父影响,莲花生大师传播的密法也是金刚乘密教。莲花生大师的另一个身份为密宗咒师。大乘佛教密宗的咒术与苯教的传统巫术有某些相似之处,因此在吐蕃社会更能适应当时社会的传统观念,也更容易被普通民众所接受。同时,在印度佛教传入西藏的这一历史时期,印度佛教正处于密教鼎盛时期,由于这些因素的结合,印度佛教逐渐战胜了苯教和汉地佛教,在吐蕃取得了优势地位,且以印度小乘佛教中的“说一切有部”的戒律为标准戒律,禁止翻译其他宗派的戒律。同时,宣布龙树所创的“中观论”是佛法的准则,在吐蕃不许学其他宗派的东西。这样基本平息了印度佛教内部的宗派斗争。并且赤松德赞在拉萨等地先后建立了札叶巴寺、钦浦寺等专门用来培养佛教僧人,这些措施的实施逐步巩固了印度佛教在吐蕃的势力。

三、佛教在吐蕃的发展和中衰

佛教传入吐蕃之后,经过几代赞普的发展,经历了短暂的中衰期。赤松德赞时期大力扶持佛教,主要是企图利用发展佛教,解决统治阶级内部王室和贵族之间的矛盾。到了其子赤祖德赞时期,发展佛教的程度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兴佛方面最突出的就是“七户养僧制”。即每七户平民负责供养一个僧人的生活,这样无形中加重了老百姓的生活负担,他甚至还将王朝的军政大权也交给了佛教僧人,在民众中引起了很大的不满和愤怒。于是,赤祖德赞被信奉苯教的贵族大臣所谋杀。被谋杀之后,贵族大臣拥立赤祖德赞之兄朗达玛即赞普位。结果导致了吐蕃王朝内部的全面禁佛运动,佛

教在卫藏地区的活动暂时沉寂下来,进入了长达百年之久的灭法期,这一时期是佛教在吐蕃的短暂中衰。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将松赞干布到朗达玛灭佛之前的这段历史被称为藏传佛教的“前弘期”。而到公元978年藏传佛教正式形成到以后的发展时期被称为是藏传佛教发展的“后弘期”。

四、藏传佛教的正式形成阶段

公元9世纪中叶以后,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混乱局面后,到10世纪后半期,从康区、卫藏直至阿里的整个藏族地区社会逐渐稳定下来,佛教又在这些地区得到复兴和发展。从阿里地区将佛教戒律传到卫藏的这条路线被称为是“上路弘法”,所传主要是密教。鲁梅等人将密法戒律从安康地区(今甘肃、青海、四川等地)传到了卫藏的这条路线史称“下路弘法”,所传主要是由唐以来汉僧引入的显教。公元10世纪初,藏族进入了封建社会。佛、苯二教也在10世纪后半期,在长期的斗争和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西藏佛教。在藏族史籍《青史》中,公元978年作为“后弘期”开始的一年,这一年是西藏佛教形成的标志年代,藏传佛教正式形成。

五、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形成和发展

藏传佛教形成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宗教也在发展。藏传佛教形成的时期,从印度传到西藏的显宗和密宗的各种主要经典都已译成了藏文,西藏佛教徒在显宗的教义和密宗的修法方面已经形成了体系,因此在教义、仪式上出现分歧,于是先后形成了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如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等派系。当然,佛教教派产生的最主要原因还是藏区封建经济的发展。

六、西藏纳入中央王朝版图之后藏传佛教的传播及发展

到了元朝,藏传佛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271年,崛起于我国北方的蒙古民族统一中国,建立起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大元帝国,西藏正式归入中央王朝的版图。成吉思汗统一中原之后,在征服其他地区的时候,深刻地认识到宗教所发挥的力量,于是训诫后世利用宗教为其政治利益服务。在此思想的指导下,为了巩固西北边疆地区,加强蒙藏民族的团结,以及为达到“因其俗而柔其人”的目的,萨班和阔端的“凉州会谈”及八思巴与忽必烈的会盟等历史性的事件将藏传佛教融入蒙古社会。统治阶级大力推广藏传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的萨迦派。此时,汉藏之间的文化交流异常频繁。在西北的哈拉浩特(今内蒙古的额济纳旗黑水城)、北京的居庸关云台浮雕,以及杭州飞来峰石窟及敦煌莫高窟都留下了藏传佛教的造像。麦积山石窟35窟中的佛祖和48窟中的四臂

观音,应是受其影响而重塑的藏传佛教的题材造像。

元代藏传佛教的萨迦派在藏区和内地的传播盛极一时,主要是由于元朝中央政权的支持,它的兴衰是和元朝势力的强弱紧密相连的。元朝中期以后,蒙古皇室的统治力量衰落了,萨迦派在西藏的地位很快衰落下来,后来被噶举派的帕竹地方政权取而代之。

及至明朝时期,中央政府沿袭了元朝推崇和扶持藏传佛教的政策,但鉴于元朝所倚重的萨迦派已衰微的状况,更重要的是为了能够与藏传佛教僧团建立更广泛的联系,采取了“多封众建”、“惟因其俗,化导为善”的政策。即对西藏各主要教派和地方势力首领均予以分封,通过分封以及袭职、替职和例贡等形式使他们各自均直通于中央,从而与明朝建立了直接的政治隶属关系。如明成祖在位时,一次就对西藏敕封了三大法王、五大国师、十大禅师,受封之人涉及格鲁、噶举、萨迦等不同教派和前后藏、安康等广大地区。在明朝这一平等优厚的宗教政策下,藏传佛教各教派得以竞相发展,出现了大兴寺庙、大造佛像的盛况。传播的地区除藏区外,还有云南、四川、甘肃、青海、内蒙古、山西五台山、北京等地。

清朝政府十分重视藏传佛教在蒙古、藏、裕固等民族中的社会影响。为了笼络蒙古上层,加强对蒙古各部的统治,清政府承袭元明时期的政策,礼遇藏传佛教,尤其是推崇藏传佛教的格鲁派,为其统一和稳定蒙藏地区服务。清政府封达赖、班禅及呼图克图,即是对这种政策的具体实施。清朝对西藏地区的施政同明朝相比,在利用、扶植藏传佛教的策略方面是一致的,因此,清朝早期藏传佛教艺术在明朝的基础上又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染织等工艺品技艺的不断提高。如唐卡艺术品的大量制作,这一时期,唐卡不仅数量明显增多,而且也形成了不同画派。但是到了清朝后期,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和艺术上过分追求繁琐的规定和要求,极大地限制了藏传佛教和藏传佛教艺术的发展。造像都普遍流于程式化,造像呆板,躯体僵硬,既缺乏外在的美感,又缺乏内在的精神力量。这一时期,藏传佛教的传播逐渐趋于衰败。

藏传佛教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主要经历了以上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直到今天,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藏传佛教不仅在我国西藏、青海、云南、四川、内蒙古等地信仰并传播,还先后传入了尼泊尔、不丹、锡金、拉达克等周边国家和地区。20世纪初,开始传入部分欧美地区,也成为西方一些国家的宗教信仰之一。

[参考文献]

- [1] 廓诺·讯鲁伯著,郭和卿译.青史[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 [2] 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
- [3] 拔塞囊著,佟锦华、黄布凡译注.拔协(增补本)译注[M].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

- [4] 多罗那他著,王沂暖节译,张澧溪校阅.印度佛教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5] 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5.
- [6] 杨建新,马曼丽.西北民族关系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